

答：沒有。

問：也許他是要告訴你，如果簽「十三」次就會中。

答：哈哈！

（轉載自「新新聞雜誌」，76、7、20—26）

《附錄》

冷靜觀察，熱情參與

吳錦發

——訪胡台麗談台灣社會觀察

胡台麗，父親是上海人，母親是江西人，她出生於台灣。紐約市立大學文化人類學博士，現任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，是國內年輕一代著名的人類學家，也是傑出的文學作家。近年她對台灣的老兵、原住民、大家樂等社會問題都有深入的研究，並且常為文在報章雜誌上發表，廣受矚目；她的近作《性與死》，是前幾年隻身深入新幾內亞叢林，採訪原始土著民族的成果。

像這樣一位視野寬廣，對台灣滿懷摯愛的外省第二代，我素來甚為欽仰，另外，對她的文學創作如《媳婦入門》《吳鳳》等也頗為喜愛，所以五月四日我專誠北上訪問了她，以下是當天訪談的大要：

吳錦發（以下簡稱吳）：近些年，我常看妳發表的文章，發現妳一會兒發表有

關老兵的研究，一會兒又發表一些農村研究方面的文章，一會兒又是台灣的原住民、新幾內亞的土著民族研究，妳到底是專門研究那一方面的學問啊？

胡台麗（以下簡稱胡）：我是唸人類學的，對於人類的行為文化我都有興趣研究，特別是有關台灣社會發生的一些比較特殊的事情，我更有興趣。

吳：但妳把研究範圍放得那麼廣，不會使妳的研究變得蕪雜而不深入嗎？

胡：其實我的研究也不算廣啊，花一輩子的時間來了解台灣社會怎麼能算廣呢？

吳：妳們中央研究院民族所，有沒有局限你們做學術研究的範圍？

胡：沒有，在這裡很自由，你喜歡研究什麼就研究什麼，沒有特別的局限，像蕭新煌研究的和我就很不一樣。

吳：同樣是有關農村問題的研究，前些年，我看到妳有一篇有關台灣農村宗教信仰的研究，提到農村土地公、土地婆的問題，我覺得很有意思，那篇文章探討的問題，很有文學的意味。

胡：我想那是因為我在做人類學田野工作時，我將我收集到的材料，採取另外一種形式呈現的結果，我並不堅持要把這些材料只以一種嚴肅的形式呈現。

對於農村的研究，我特別喜歡研究一些農村非正式的發展現象，那些正好是

平常官方資料看不出來的東西。譬如我特別注意台灣農村小型工業的發展，它怎麼和台灣農村結合起來，怎麼樣發展？它是在一種什麼樣的基礎下發展起來的？等等。

吳：包括它對台灣農村家庭結構的影響？

胡：對，影響農村家庭的因素，我也不會只看一種力量，我還會探討力量與力量之間往往返返等關連性。

譬如說：台灣的農村家庭一直在不斷的變遷，在變遷的過程中，有一些觀念（譬如父親的權威）有日漸式微的傾向。但是當這些觀念式微之時，另一些觀念却又不斷在加強（譬如：農村家庭希望有一種凝聚、加強整合的力量），父親希望孩子能留在身邊，但事實情況却又逼得孩子不斷地往外遊離，這些力量要怎麼調和呢？

台灣農村的小型工業，就是因為在這種父母一直想把子女拉回來，而子女也還不能完全脫離對大家庭依賴的心理影響之下，才能如此蓬勃發展。

再舉一個例子，談到台灣農村的婚姻問題，我就會特別注意婚姻之外，所謂「非正常」的那些婚前懷孕的現象，這些現象常被人忽視，但是經過研究，我發現那些現象反而更普遍。現在台灣農村的男女青年婚前性行為的頻率高得出奇，

這些反而在正式的調查研究資料中為人忽視了。

吳：這個問題我很有興趣，妳認為是什麼原因使台灣農村的青年男女婚前性行為頻率那麼高？

胡：以前在各種文章中，常有人提到「台灣社會是一種中國式社會」，他們所謂「中國式社會」就是用傳統的那種禮教很強的保守社會類型來代表它。但是我的研究發現，今日的台灣社會早已大大不同於那種所謂「中國式社會」。他根本早就離開那種型式的社會很遠了。

吳：那就好比今天還有很多人一提到「台灣人」這個概念，還把「台灣人」定型在四、五十年前那種台灣人形象，其實今天的「台灣人」早已大大不同於四、五十年前的「台灣人」了，譬如今天台北西門町那些喜歡穿著奇裝異服的年輕人，他們不也一樣是「台灣人」嗎？

胡：對，所以後來我發覺，所有那些被官方正統概念所忽略、所排斥，有時甚至被扭曲的現象，常常反而是台灣社會最普遍的現象。你表面上看起來，我一下子在研究原住民，一下子又研究農村，其實最近幾年我一系列的研究是非常關注台灣社會幾種變遷現象。我的目標就是：我想弄懂在正式的官方塑模的形象之外，台灣社會底層真正的文化結構是什麼？塑造台灣社會變成目前風貌的因素為

何？台灣社會和傳統中國式社會已經分道揚鑣的地方在那裡？

吳：兩、三年前，一個澳洲來的女社會研究者，在我家鄉從事農村研究，我看她的研究方向都一直偏重在一些經濟數字的統計調查，我就很擔憂她是不是對台灣農村底層的文化特徵有所認識，如果不懂這些，她會把台灣農村社會詮釋成什麼模樣？

胡：以前在這方面我也是挺欠缺的。人類學最好的地方就是：對很多人類社會的現象，它不事先下結論。它要求人類學者先投入到那個社會情境裡滾一滾，體會一下，然後在這裡面設法去捕捉那個社會的精神面貌。我研究台灣社會之後，發現官方的資料，很多在解釋社會現象方面都有問題。所以，我就重新出發，自己先投入到社會裡去做各個角度的觀察。譬如，前些年我研究大家樂……。

吳：這個問題我有興趣，最近是流行六合彩，對這些現象妳有什麼看法？

胡：六合彩和大家樂性質都一樣，我是比較專注研究大家樂在宗教層面的意義，我覺得它所反映出來的宗教層面和我們現實社會互相反映、關照的關係很深。

吳：妳能不能說得更具體一些？

胡：我看報紙雜誌上的言論，都從「道德」的層面譴責它。我爲了了解它，親自跑到鄉下去和那些賭迷一起跑一跑，我深切地感受到，我們台灣社會近一、

二十年來，可能真的是轉變得太快了，農業社會中那些人與人之間親密的感覺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是工業社會縮得很緊的精神狀態。人們很渴求另一種親密忘我的感覺，帶有一點嬉笑怒罵的，帶有一點自我嘲諷味道的活動，大家樂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人們這種需求。

像這個層面的觀察，是我以前在看「譴責性」的文章所沒有發現的。另外，我在研究大家樂的現象時，發現樂迷們常「請」出來問明牌的神如：孫悟空、濟公、太子爺，這些神明的位格都很有意思，他們以前在正統的神格中都不是地位很高的神，現在樂迷們把祂們強化、普及，所有那些陰神也都被提了出來……。

吳：像那些「水流仙姑」之類的……

胡：很有意思，這也可以看出，台灣社會在急速轉變的過程中，有很多不是那麼受舊有嚴謹規範的東西跑了出來……。

吳：最令人訝異的是，我發現我們家鄉一些平日最痛恨家人賭博的鄰居，竟然也在玩六合彩。

胡：是啊，我在研究的過程中，也發現許多向來被稱為最「古意」的人，却玩得津津有味。

所以以前我們譴責玩大家樂、六合彩的人是「非理性的」，我想這個看法恐怕

也有問題，我覺得它在「非理性」的表象中一定也有它「理性」的道理；我發現，在我們譴責這些現象時，我們沒有發現，事實上，它是有一種潛藏的生命力在。譬如：台灣社會在轉變的過程中，突然要從保守中開放出來，大家變得很不能忍受那種傳統權威的禮教束縛，在這種時代，人們就比較會去表彰一些特殊的人物或神明，像濟公、孫悟空、大眾爺等比較不那麼正式的象徵。

吳：台灣社會近些年的轉換，真的是可以用「天翻地覆」來形容，不但「正式層面」的東西變了，所有「非正式性」的東西也跟著轉變了，譬如：黑社會的倫理也變化很厲害，新起的一代黑社會分子早就不談什麼「輩分」不「輩分」了。

胡：對，像六合彩、大家樂等等，都是台灣社會在大轉型中的一種「現象」。一個社會的轉型，我把它比喻成人類學上所謂「儀式性」的轉換一般，我們在研究人類的「儀式」轉換的現象時，譬如「生命儀禮」，一個幼童要成為成人，在某些社會舉行「成年禮」時，他們會經過一個非常嚴苛、違反常理的過程，在這個過程裡，會有一些很特別的現象；就像我們看到一個社會舊有秩序被打散以後，它便處在一片混沌的狀態之中。台灣社會現在就是處在這種狀況中，在這種狀況中，它就會產生很多特殊的人物事件，這些事件我們乍看之下好像很奇特，但我想這些事件一定有它很深的意義，它可以點醒我們，使我們在混沌之中重新思考

一些問題，然後再尋求起步的方向。所以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就常常喜歡思考一些特殊的人物，譬如，老兵，這個特殊的族群，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和一般人非常不同。

吳：妳研究老兵的問題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發現？

胡：我只能說，他們在台灣社會中，是很突出的一個族群，他們特殊的地方就在：他們發現台灣目前的社會狀況和他們「格格不入」。

吳：有被「遺棄」的痛苦？

胡：不只是那樣的一種感覺，心理上覺得有被這個社會「隔離」的感覺！他們是台灣幾個移民群中，最新的一批移民，這些新的移民，要怎麼樣和更早期的移民群結合在一起？這裡面一定有很多問題存在。

吳：以往我們政府都一直在掩蓋，當作敏感問題，不讓人去談論它。

胡：是，另一方面，這群移民也和現有的政權有最密切的關係，他們是現有政權的「根」。所以我研究他們的問題時，我覺得他們對現有政權有一種「圖騰」式的情感。他們對國家和黨，有類似於宗教似的情操。

吳：老兵是新移民群中的一個部分，像妳，有人稱你們是「外省籍第二代」，有人說，像你們這種新移民的第二代，要在今日台灣社會中爭取地位和權力愈來愈

愈困難了，妳真的有感受到這樣的問題嗎？

胡：我覺得這應該是一種自然的現象，當一個新的移民群要融入一個本土的社會時，一定會有一段時間的痛苦和掙扎存在。怎麼樣讓這些矛盾平覆呢？我們要怎樣把他們包容進來呢？這一定需要時間來讓它慢慢轉化。像我自己本身就經歷過這種反省的過程，我覺得舊移民群和新移民群，彼此都應該有點耐性。我做老兵研究、眷村的研究，也就是希望幫忙促進我們社會中不同群體的溝通。我覺得「榮民」應該儘量把自己「平常化」，和本土社會結合起來。

我做老兵研究最大的收穫就是，我活生生地看到了另一波移民群融入台灣社會的過程，這就如同歷史上先後幾波移民群融入台灣社會的過程。

吳：台灣社會最近發生的另一種現象，也很吸引我的注意力，譬如：原住民、客家人，以前被稱作台灣社會比較「弱勢」的族群，好像突然都醒了過來，在很多次的社會運動中，聲音逐漸大了起來，依你看這又是什麼原因？

胡：在一個社會大轉變的「儀式」過程中，往往，以前被忽略的部分都會表現得特別活潑，弱勢的團體就會站出來「更大聲」表現出自己的主張。

吳：因為「大聲」才有人注意到他們？

胡：對，其實在社會轉換過程裡，我們不但要他們「大聲」，而且還要他們「更

大聲」，這樣才更能凸顯他們的問題。

吳：這是不是也就是最近幾年，各種社會運動層出不窮的原因？

胡：是，也許有些人會認為這種現象不正常。其實，它反而常常是在凸顯以前大家以為「正常」的，事實上並「不正常」。

在社會大轉換的時期，正好可以給我們一個機會，當我們看到一種我們認為「不正常」的現象時，我們可以好好重新思考，到底什麼是真正「正常」或「不正常」？以做為一種觀念上的修正，做為重新出發的基礎。所以，最近我專門在注意一些人們認為「不正常」的人或事務，譬如：許曉丹裸體事件，朱高正跳桌事件，大家樂、六合彩……等等。

吳：我覺得這方面的研究應該多一些才對，這樣或許更可以幫助大家冷靜去思索，做判斷，解決一些事情。

胡：對，在這樣的時刻，每一種事件都應該促使我們更冷靜思考，先思考再做判斷。

吳：但是，我們現在很多行政官員，對這些現象却很緊張，認為這樣下去不得了，整個社會會亂掉。

胡：因為這些現象往往對一個既定的權威是一種挑戰，一定會使行政官員的

行政程序複雜化，讓他們困難增加很多，所以他們絕對會反對！

吳：因為不能像以往一樣，一個命令便把問題單純地解決了，所以使得他們很沒有安全感。

胡：我是希望我們的研究發表出來，可以供給他們和大家一起思索，這也就是我比較喜歡停留在學界的原因。

吳：我看妳有時候把研究的結果，以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來，在妳的觀念裡，文學對妳還是比較次要的形式嗎？

胡：也不是，其實我也很認真在寫，只是我不知道那是「文學作品」罷了，我沒有把它和一些論文做很清楚的分界。我只是覺得有些題材，用那種形式表達比較能說得清楚，我就選擇了那樣的形式來表達。也許那種形式人家便認為那是「像小說」或「像散文」的東西吧（笑）。

吳：就像最近妳出版的那本《性與死》……

胡：我一向喜歡「非形式」的東西，像電影、小說、散文，在以前，相對於正統的學術範圍，它們往往被視為非形式的，或者被當作「不夠學術」的，有些學者就比較輕視它們，但在我的觀念裡我不會輕視它們，我想把它抓過來，用來傳達我的理念，達到某種目的，把訊息傳達給另一批讀者。

吳：我最後再請教妳一個問題，妳近年研究了台灣原住民的問題，又曾經到新幾內亞去做了當地的原住民社會的研究，妳覺得台灣的原住民和新幾內亞的原住民問題有什麼差別沒有？

胡：說實在的，我對台灣原住民的問題並沒有很深入的研究，我只能說非常關心。新幾內亞在人類學家心目中是人類研究的「聖地」，因為他們的社會竟然可以包容了六、七百個不同的部族，而且在近代轉化為一個國家的過程中，它一方面要顧及傳統，一方面也要走入現代化。

吳：妳覺得他們組合得很好嗎？

胡：也不盡然，他們現在才正在起步。但是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優點，那就是各部族之間在組成國家的過程中，立足點比較平等，不像台灣或中國社會，總是有一種「漢人」優越意識凌越在別的種族之上。他們所有六、七百個部族，大家都站在平等的立足點上，往形成一個國家的目標上組合，這是台灣比不上的。如有種族的歧視，就會產生大吃小，資源分配不公平的事！

吳：這也是我一直擔憂的事。

胡：我是特別注意台灣原住民文化面的問題，包括台灣原住民對自我族群及文化的認同。我覺得，這一方面的知識，甚至現在從事原住民運動的原住民知識

青年本身也都非常欠缺，他們也染上了我們平地社會「經濟優勢論」的傾向，不覺得自己的文化有多了不起。

我一直在這一方面想幫助他們，所以近幾年我才去拍一些紀錄片，讓人們了解原住民文化是有它非常精華的一面。譬如矮人祭典中那一套矮人祭歌，實在是漢文化中很難找到的漂亮構成，又美又完整，整個祭典的歌舞融為一體。像這些質素，如果連原住民自己都認為不重要，不保留它，不引以為傲，那真是太可惜太可惜了！

吳：妳說得很令我感動，我們就談到這兒為止，今天謝謝妳接受我的訪問。

（原載於78年5月29日民衆日報）